

编者按: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对于执政党和国家来说,这次大会都是本年度头等重要的政治盛会,不仅关乎着共产党的未来,也影响这个国家的下一步。

十一大以来,只有十三届党中央召开了9次中央全会,其他每届中央都召开了7次全会,作为每届“压轴”的七中全会,议题之一就是根据政治局的建议决定下一次党代会的召开时间,同时还要讨论通过下一次党代会的报告和党章修正案。

召开中央全会时,如果中央委员出现缺额,那么就要递补。即便七中全会结束时离下一次党代会只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递补工作仍然要做,十七届七中全会就递补了两位候补委员为中央委员。

七中全会结束时,各省的书记、省长一般也不再回去,而是留在北京与即将赴京开会的本省代表会合。代表们报到后,中央领导人按惯例会分赴驻地看望、慰问。十八大召开前,习近平看望了中直机关代表团的代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过6次全国代表大会。6次大会的共同的主题词有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建设。对比新中国成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召开的3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把握时代主题的巨大变化。

党代会的重头戏是政治报告的起草。由于战争年代的限制,六大、七大政治报告多是领导者个人智慧的体现。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起草都是由起草组(或起草小组)完成的。

通过党代会这一平台,党的意志将得到凝聚,并实现新的人事更替。如此重要的会议,其代表如何选出?会议议程如何进行?史上历次会议有何异同?历次党代全的政治报告是如何出台的?作为党代表如何上传下达,凝聚人心?

本期推出“党代会”专题,力图向您提供一幅党代会的真实图景。其他栏目的文章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本期专题·党代会

- 02 党代会如何召开
- 06 历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是如何出台的
- 13 盘点历次党代会会址

政坛经纬

- 15 十九大前发布的这则重磅意见,很有意味

人物春秋

- 17 忙人郭明义

悦读时光

封三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

——关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十三)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党代会如何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视觉中国/图)

除了接受履职培训，党代表从当选到党代会召开之前，还有不少准备工作要做，十八大代表就提前阅读了即将提交大会表决的党章修正案(草案)。

每个党代表都领取到三张颜色不同的选票，分别写着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候选人的名字，名字按照姓氏笔画排序，如果同意就不用做任何记号，如果不同意就画圈，弃权就打叉，选票边上还有“另选他人”一栏。

党代表提前看党章修正案

跟五年前十八大于11月召开相比，不少人都觉得“十九大提前了”。事实并非如此，改革开放以后，在11月召开的党代会只有十六大和十八大，而十三

大、十四大、十七大都是在10月召开的，十五大则于9月召开，比这更早的是十一大和十二大，召开时间都在8月。

在召开时间上，十九大并无特殊之处。倒是出席的代表人数再创新高，达到2300人，比十八大增加了30人，虽然人数增加，但增幅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小的一次。

中共党史上，只有二大、四大、六大和十大的党代表人数，少于上一次，二大的代表只有12人，比一大时还少1个。另外14次党代会的代表都比上一次有所增加，改革开放以后，增幅最大的是十三大，比十二大时多了391人，其余几次增幅都在100人以内，十九大增幅最小。

这2300位十九大代表由40个选举单位分别选出，包括31个省份、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央金融系统等。值得一提的是，之前几次党代会的代表选举单位都是38个，到十八大时才增加到了40个，但开会时的代表团仍是38个。

代表的选举过程可谓“上上下下，反反复复”。以江苏省为例，该省共选出了69名十九大代表，但全省各基层党支部第一次推荐的人选就多达38164人，此后经过三轮遴选后，确定了90名初步人选推荐人选。

据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报道，今年3月，省委组织部向中组部汇报了这90人的情况，经中组部同意进行公示后，又召开了省委全会，从中确定了

80人作为候选人预备人选。之后再次上报中组部,待批复后才提交省党代表会议进行选举。

为了防止“带病提名”,江苏省委组织部还就中管干部以外的人选征求了省纪委的意见,6月30日,69人被正式选出。与上届相比,江苏省出席十九大的代表“结构更加优化合理”,其候选人中,基层一线代表比例提高了4.6%,工人代表比例提高11.1%,农民工代表从1名增加到3名。

按惯例,党代会召开前要对这些新当选的基层和一线代表进行履职培训,目前尚未见到对十九大代表进行履职培训的公开消息。不过从对十八大代表的培训来看,各代表团培训的时间和内容有所区别。

“我们开会前进行了党性教育。”十八大中直机关代表团的一位代表说,2012年9月17日下午,中央党校中直分校通过《真情在线》党性教育课,对参加十八大的一线代表进行了培训,邀请了井冈山时期革命先人王佐、曾志、江洽华3人的孙辈,讲述他们与爷爷、奶奶的故事。

十八大召开之前,天津市生产和工作一线的十八大代表履职培训则持续了两天。军队出席十八大的基层和一线代表,则被安排到上海,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此外还走访了诞生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

除了接受履职培训,党代表从当选到党代会召开之前,还有不少准备工作要做,十八大代表就提前阅读了即将提交大会表决的党章修正案(草案)。

《中国共产党章程》自中共二大正式通过后,已经过多次修改,如十三大规定了差额选举,十四大明确不再设中顾委。十八大则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

目前,十九大的各项工作都按照10月18日开会作日程准备,不过准确地说,这还只是个建议时间,最终要由10月11日召开的十八届七中全会来作决定。

十一大以来,只有十三届党中央召开了9次中央全会,其他每届中央都召开了7次全会,作为每届

“压轴”的七中全会,议题之一就是根据政治局的建议决定下一次党代会的召开时间,同时还要讨论通过下一次党代会的报告和党章修正案。

召开中央全会时,如果中央委员出现缺额,那么就要递补。即便七中全会结束时离下一次党代会只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递补工作仍然要做,十七届七中全会就递补了两位候补委员为中央委员。

七中全会结束时,各省的书记、省长一般也不再回去,而是留在北京与即将赴京开会的本省代表会合。代表们报到后,中央领导人按惯例会分赴驻地看望、慰问。十八大召开前,习近平看望了中直机关代表团的代表。

忙碌的大会前一天

代表们报到后,就算进入“党代会时间”了,真正忙起来则要到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天,这一天要开若干个重要会议。

2012年11月7日,也就是十八大召开的前一天上午,各代表团在驻地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当天第一个重要会议。

会议传达3天前闭幕的十七届七中全会会议精神 and 十八大报告起草与党章修改工作的说明。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使命是选举代表团团长。就31个省份代表团而言,通常是“一正一副”,由书记担任团长,政府首长担任副团长。

每个省除了书记和省长,副书记、组织部长以及纪委书记成为党代表的几率也很大。有些省份设了2名副团长,另一人就是省委副书记,但如有省内正省级干部是党代表,往往就由后者担任副团长,十八大召开时,山东省政协主席刘伟、河南省政协主席叶冬松都是各自所在代表团的副团长。

为保证代表团这一临时组织有效运行,各代表团还设秘书长一职,如果省委副书记不是副团长,一般都担任秘书长,如果副书记兼任了副团长,则由组织部长出任秘书长。

上午选出了代表团团长,下午所有代表都要集中到人民大会堂,召开预备会,这是当天第二个重要

会议。

党代会开幕前举行预备会的做法始于中共六大。此后除了十大，历次党代会都要先开预备会，七大的预备会开了2天，八大预备会的时间最长，一共开了14天，并与七届七中全会套开。从九大开始，每次预备会的会期固定是半天，十五大起，预备会的议程开始固定，包括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名单、大会主席团名单和大会秘书长名单，以及通过大会秘书处工作任务、机构设置及大会议程。

十八大预备会是在胡锦涛主持下召开的，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并确定了大会秘书长。审查委员会主任一般由时任中纪委书记担任，分管党务工作的政治局常委通常都担任秘书长，十八大的秘书长就由习近平担任。

列席与特邀的区别

十八大召开时，列席的党内人员有314人，他们分为三类，包括不是十八大代表的十七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以及不是十八大代表、特邀代表的原中顾委委员，还有就是曾经列席过十七大的部分党内老同志，以及其他人员，如副部级单位的负责人等。

列席十八大的还有147名党外人士，有现任和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党外人士，以及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主席和在京副主席，以及无党派代表人士，此外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在京常委中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民族宗教界人士，也受邀列席。作为礼节，党外人士列席时都入座贵宾席。

历史上，不同时期党代会列席人员身份的差异很大，一大、三大至六大都有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其中五大还邀请了国民党要员谭延闿、徐谦、孙科出席。八大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不仅邀请了国内党外人士列席，还邀请了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参加大会，他们和中国的民主党派人士一起向大会表示祝贺。

从十三大开始，列席人员的构成开始固定，直到十八大都保持基本一致。党代会历史上，十三大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邀请境外记者参加、差额选举中央委员都是自那次开始。安排特邀代表也是从十三大开始的，与列席人员没有表决权不同，特邀代表与正式代表是享有同等权利的，都有资格成为主席团常务委员。

能成为特邀代表的都是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特邀代表一般参加中直机关代表团的活动中。出席十六大的特邀代表是40人，十七大、十八大都是57名，去年11月，中组部负责人公开表示“中央将确定一部分已退出领导岗位的老党员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大会(十九大)”。

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盛会离不开乐曲，2012年11月8日上午9点，宣布十八大正式开幕，全体代表首先起立奏唱国歌。

在党代会开幕和闭幕时奏唱乐曲的做法始于三大，那次瞿秋白在会议结束时带领大家高唱《国际歌》，此后历次党代会开、闭幕时都会奏唱乐曲。闭幕时常奏《国际歌》，但开幕时选用的乐曲却几经变换，十一大开幕时演奏的是《东方红》，闭幕时演奏了《国际歌》，十三大、十四大在开、闭幕时都选用了《国际歌》。从十五大开始，奏唱的乐曲开始有定制，一直到十八大，都是开幕时奏国歌，闭幕时奏《国际歌》。

奏唱国歌之后，大会又宣布为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

在党代会开幕式上安排默哀这一环节已延续多年，但提法有所变化。

从十六大开始，到十八大开幕时的表述一致都是：“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已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

默哀过后，就进入了每次开幕会的“重头戏”——上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通过报告里的提法，可以看出党的主张和意图。

从二大(当时是中央局)开始,每次党代会开幕时,中央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都要向大会作报告。不过“报告”的名称经历了多次变化,二大到四大称“工作报告”,五大称“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六大到十一大称“政治报告”,从十二大开始至今一直沿用了“报告”的叫法。

讨论十八大报告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1月8日下午和9日全天,这两天代表们也讨论了选举办法。

到了大会的第三天,也就11月10日,代表们开始讨论中纪委工作报告和党章修正案。不过,当天下午代表们还在讨论时,大会主席团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已将话题切入党代会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环节——人事选举。

在这次会议上,大会秘书长对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作了说明。

为了这份名单,中央早在1年前的2011年7月,就已派出干部考察组,对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委员候选人选进行考察,到2012年6月结束,持续整整1年。

干部考察组考察组长一般都是由在职或刚退出一线岗位的正部级干部担任,每次出发之前,由中央换届办确定小组成员,组长、副组长的搭配每次都要重新组合。

一年内,中央先后派出59个考察组,考察范围包括31个省份和130个中央国家机关、中央金融机构、在京中央企业。中央军委也派出了9个考察组,分赴全军和武警部队各大单位进行考察。

考察组到省区市考察时,首先会商省级党委主要领导,按1:1.5到1:2的比例,提出考察对象初步名单,此后召开省级党委全委会和全委扩大会,对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委员考察对象初步人选进行一次投票,不同意率超过三分之一的,不再列为考察对象。

中央政治局对考察人选经过多次讨论,最后才形成了交由大会主席团说明的名单。

从大会第四天开始,各代表团开始对中央委员

会和中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进行酝酿,“酝酿时都是自己一个人在思考,不与其他代表互相讨论。”据一位十八大代表介绍,大会秘书处给每个代表都发了一个册子,上面写明了每个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可以在上面做记号,但册子只在会议室里看。

经过一天酝酿,进行到大会第五天时,开始差额预选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候选人,差额率分别是9.3%、8.5%。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的预选工作是在第六天进行,差额率为11.1%。预选结束后,选举的第一阶段结束。

同一天,也就是11月13日上午,预选结束后,十八大主席团紧接着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对预选结果进行汇总,通过了候选人名单(草案),并提交给各代表团在当天下午继续酝酿,等待正式选举的到来。

11月14日上午9点,十八大召开全体代表会议,以鼓掌通过的方式确认了监票人和总监票人名单,监票人在检查了票箱、统计出席的总人数之后开始发放选票。

每个代表都领取到三张颜色不同的选票,分别写着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候选人的名字,名字按照姓氏笔画排序,如果同意就不用做任何记号,如果不同意就画圈,弃权就打叉,选票边上还有“另选他人”一栏。

11时27分,胡锦涛宣布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产生,选出了205名中央委员、171名候补委员和130名中纪委委员。

接着,大会闭幕。代表们至此已经完成了此行的各项任务。

11月15日上午,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习近平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选出新一届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当天下午,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与代表们见面、合影后,代表们才陆续踏上返程,他们的“党代会时间”正式结束。

(南方周末记者 吴天适 实习生 张鑫晔)

历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是如何出台的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主旨是概括总结党在前一阶段的工作，向全体党员阐明今后党的工作方针，并对未来进行展望。它通常是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是夺取新胜利的思想武器，是继续开创伟大事业新局面的行动纲领，是新阶段党的自身建设的行动指南。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笔者对此前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进行了一些梳理和研究，旨在帮助读者加深对党的政治报告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更好地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努力奋斗。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发展

在党的历史上，被冠以“政治报告”的文献屈指可数。

1926年10月11日中局会议的文件被冠名为《中央政治报告》，这是一份介绍全国政局、通报党的对策的文件。该文件最早由1926年10月13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七期刊印。

1926年12月13日，陈独秀在中央特别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被冠名为《政治报告》，报告指出了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存在的各种危险倾向和几项挽救的策略。

1927年1月8日，一份副题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主要工作》的文件被冠名为《中央政治报告》，该报告被刊印在《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五期上。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仅有两个在标题中有“政治报告”的字眼。八大政治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十一大政治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有报告这个环节，有的是工作报告，有的是修改党章的报告，有的是军事报告，有的是组织问题的报告，等等。通常，

这些报告中有一个主要的、重要的报告，被党史理论界称为政治报告，但不是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报告都被称为政治报告。

一大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会议第一天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作报告，大意是：1. 国际形势；2. 第三国际的工作状况及其使命；3.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马林很善于言辞，报告的时间很长。马林的报告没有被称为政治报告。

二大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作中央工作的概况及政治主张的报告，这个报告没有被称为政治报告。

1923年6月，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第一天由陈独秀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他着重谈了二大以来的革命形势和党的发展情况。这个报告没有被称为政治报告。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四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五大在武汉召开。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和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陈独秀在四大、五大上的报告都没有被称为政治报告。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这是第一份被党史研究界称为政治报告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报告。此后，各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主报告都被称为政治报告。

需要指出的是，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全会中的主报告，有时也被称为政治报告。例如，1938年9

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中有许多报告：9月30日上午，项英作关于新四军工作报告；9月30日下午，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10月2日至3日，朱德作八路军工作报告；10月4日，贺龙作关于晋西北工作的报告；10月7日，罗荣桓作关于晋西工作报告；10月8日，杨尚昆作关于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以及晋西南工作的报告；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10月15日，张闻天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11月1日，康生作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11月6日，刘少奇作党规党法的报告。这诸多报告中，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被称为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分为8个部分：1. 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2. 抗战15个月的总结；3.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4. 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5. 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6. 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7.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8. 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的报告是这次会议所有报告中最重要最全面的一个，称为政治报告，当之无愧。

六大、七大的政治报告不但有书面报告，还有口头报告的部分。1928年6月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早在4月间，他已写成一个书面报告。在口头报告中，他只就书面报告未展开的意思，加以阐述和补充，分为5个问题：1. 中国革命问题；2. 过去的教训；3. 现在阶段盲动主义的危险；4. 革命形势；5. 党的任务。口头报告长约7万字，讲了9个小时。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向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同一天，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口头报告。他从书面政治报告的内容中提出三个问题，更充分地展开论说。这三个问题是：路线问题；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党内的几个问题。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后，无一例外地出版了单行本。六大政治报告单行本与报告原稿略有出入，题目作了一

些改动，文字也作了删改。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建议六大决议的通俗化宜从速进行，由一些同志做些通俗地宣传六大决议的工作。他自己也动笔，撰写宣传六大精神的小册子。不久，一本6万字的通俗读物写出来了，书名叫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由中央出版局1928年出版。这本书开门见山，第一段文字就把读者紧紧抓住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倒清朝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便是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但是老百姓的生活依然非常痛苦。辛亥革命，并没有打倒官僚军阀，平民仍旧是受压迫，外国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更加剥削中国的工农。这是为什么？说起来，原因很多呢！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出版单行本时，仅署报告人的名字。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撰写

由于战争年代的限制，六大、七大政治报告多是领导者个人智慧的体现。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对大会代表的选举进行部署，六大的筹备工作启动。1928年4月，瞿秋白写成一个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报告》，约10万字，分为3章：中国革命领导权之争；中国共产党之过去与前途；中国革命当前的问题。

1945年七大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为这个报告费了很长时间，对文章中的措辞都进行了仔细推敲。对国民党如何措辞，毛泽东曾考虑半年之久。“是否采取绅士腔调如同招待新闻记者那样？那时我们的名誉很好，可是斯坦因、福尔曼对我的谈话就很不满意，那种腔调有一很大缺点，即不能说透问题，不能揭破蒋介石。或者如同苏联的态度那样？这也不适当……那末，是否像《解放日报》那样？也不好，《解放日报》可以那样说，但也并非天天说，我们的负责人就不宜于那样说。我在这个报告里面批评了他九分，批评很尖锐，但留了余地，有希望，虽然只占一分不足。这是需

要的，不留这个余地就会犯错误。对国民党抗战成绩我没有多说，从科学的意义上应说国民党是半法西斯主义，我没有说，免得为他们张目。对他们的说法我是随地而异的，其基本精神是我们的独立性更强了，但对蒋介石仍留有余地。”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更多地融入了集体智慧，有的成立了专门的起草委员会，有的成立了报告起草小组。无论是报告起草委员会，还是报告起草小组，都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例如，195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名单。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7人组成。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这项工作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定下来的。起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是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指导思想。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随之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起草都是由起草组（或起草小组）完成的。例如，2006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十七大报告起草组。12月1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组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胡锦涛总书记担任起草组组长，刘云山、曾培炎担任副组长。起草组的成员，有来自中央机关、国家部委、军队的负责同志，有地方领导干部，也有专家学者。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把起草过程变成广开言路、集中智慧、凝聚共识的过程，这是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重要经验。例如十七大政治报告稿在10个多月的起草过程中，胡锦涛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6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2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报告起草工作的情况报告，审议修改报告稿。主题、框架、初稿；调研、讨论、修改……在近10个月的时间里，起草组共召开10次全体会议、40多次工作班子会议，连同小组会议在内，各类会议总计100多次，

对报告稿反复讨论、认真推敲、精心修改，先后正式改稿50多遍。中共中央还委托中央统战部，就党的十七大报告议题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

但有的政治报告中的内容并不能达成一致，例如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时，是应当以全面推进改革还是以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中心内容，就存在分歧。胡耀邦认为，为了实现20年的奋斗目标，在农村改革已经取得成效的形势下，必须在经济体制方面已经进行初步改革的基础上，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面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开创新局面，才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政治报告以此为核心，予以强调，是适宜的。但是，报告组主持人却要强调调整，坚持要在政治报告上写明：“在1981年到1985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很快”。他只把胡耀邦的上述重要观点附带在后面，以“同时”连缀起来。胡耀邦对这种表述是不满意的，但是他的意见被拒绝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召开了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即1969年召开的九大和1973年召开的十大。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充满了斗争。1969年2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九大政治报告）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中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矛盾很深，他是不会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合作的，更不会与张、姚二人共同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因为经毛泽东提议，由中央正式通过的九大政治报告起草人的名单中，陈伯达名列第一位，毛泽东后来又指定他当起草组组长，因此，陈伯达下决心自己干。他把张、姚二人甩在一边，自己找了几个助手，由他自己构思，自己写作。由于张、姚是被列入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名单的人，他们当然不甘被冷落，于是，他们多次主动找陈伯达，要陈伯达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

起研究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陈伯达干脆向他们挑明了自己的态度：你们搞你们的，我搞我的。最终，九大选用了张春桥、姚文元写的政治报告稿。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报告人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由谁来作，是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决定的。政治报告通常是由时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来作，有时是中央政治局决议由党内职务高、威望高的人来作。六大的政治报告是瞿秋白作的。1927年5月瞿秋白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6月增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瞿秋白主持，会议纠正和结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对中央的领导，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举产生中央临时政治局。瞿秋白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席。1927年11月后犯了“左”倾盲动错误，不久即被制止。

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9月下旬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个决定，中央及时电告了常驻武汉同国民党上层搞统一战线工作的王明。王明权力欲望极高，他致电中央说准备回延安出席六届六中全会，不过政治报告要由他来作。王明深知，谁作会议的政治报告，就意味着谁是第一把手。王明很懂得这一套，非力争不可。中央电复王明：你来延安开会极好，谁作政治报告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决定，你先准备也无妨。这样，王明才离开武汉，乘火车到西安。到达西安又停了下来，觉得作政治报告之事尚未敲定，即电告中央，提出政治报告由他作才能来延安，否则就回武汉去。中央电复王明还是到延安后再商量，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报告内容后再定。就这样，王明才勉强来到延安。

七大的政治报告是毛泽东作的。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37年写出《实践论》《矛盾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认识论和辩证法。1937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1938年写出《论持久战》等著作，为党制定了正确的抗日战略方针和具体政策。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1940年5月开始主持中央工作。1943年3月被推定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为书记处主席。1945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具体政策，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同年在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并兼任中央军委主席。

八大的政治报告是刘少奇作的。1939年8月，刘少奇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它与后来撰写的《论党内斗争》等著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1943年3月，刘少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1945年在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49年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55年9月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副主席。

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扩大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话。刘少奇报告了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各项工作，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会议转为集中揭发刘少奇、邓小平。8月8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8月12日，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林彪取得了中央常委第二号位置。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原来的副主席职务以后即不再提及。1969年，林彪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副主席，并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进党章。

十大的政治报告是周恩来作的。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有5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

恩来、康生。1971年9月，林彪出逃死亡。1973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撤销林彪、陈伯达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党籍。这样，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剩下3人，毛泽东、周恩来、康生。

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是华国锋作的。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自1976年2月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任国务院代总理；1976年4月7日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10月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继任国务院总理。

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是胡耀邦作的。1980年12月，胡耀邦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工作，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华国锋请求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未获准。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等职务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赵紫阳作的。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同意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推选赵紫阳代理该职。1987年11月，赵紫阳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总书记，兼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政治报告均是江泽民作的。江泽民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最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9年11月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年3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任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当选为国家主席，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1997年9月继续当选为中共第十五届中央

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任中央军委主席。1998年3月继续当选为国家主席，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2002年11月继续任中央军委主席。2003年3月继续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2004年9月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十七大的政治报告是胡锦涛作的，这是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的首份政治报告。胡锦涛在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2003年3月，当选为国家主席。2004年9月，兼任中央军委主席。2007年10月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任中央军委主席。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内容

从写作角度来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具有一定的模式化的特点，所以通过分析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使用词语的变化，可以了解当时的时代特征与变化趋势。

六大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报告》，从理论上正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左”倾盲动主义，瞿秋白进行了自我批评，也希望代表们批评自己。在批评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时候，瞿秋白提出了“共产党内的枪杆子主义”的问题。瞿秋白痛感于自己以及党的一些领导人既缺乏革命实践锻炼，又缺乏革命理论修养，对于革命造成的损害。报告指出，一个党，一个党员，一个革命者，只有用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才能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胜利和成功，而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革命理论将会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更好地指导革命运动的前进。

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共分为5个部分，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民主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抗战以来国共两条抗战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党必须实行“放手发动群

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为此，报告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完整地制定了现阶段的具体纲领和政策，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斗争口号；强调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同时提出准备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指出加强党的领导是争取革命胜利的关键。报告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全党要保持和发扬这些作风，更好地团结和率领全国人民，完成党的战略任务。

六大、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政权前召开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七大则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抗日战争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党的八大于1956年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政治报告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报告肯定了党中央从七大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同时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报告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大会做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大会在总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

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1969年召开的九大，林彪作《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把党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所谓“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对中国社会的形势以及党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报告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紧迫和夸大的估计，过分强调要准备打仗。

1973年召开的十大，周恩来作《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份报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主持起草的，报告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等，这就全面肯定和继承了九大的错误，使“左”倾思潮延续下去。

1977年召开的十一大，华国锋作《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政治报告主要内容是：第一，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批判了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第二，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因此，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第三，重申在

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报告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8项主要任务，要求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本年内初见成效，3年内大见成效。

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在改革开放前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遗憾的是，八大的正确路线很快被抛弃，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并且在九大、十大、十一大上得到确认，得以延续，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

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政治报告题目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报告共分为6个部分，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新取得的经验，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报告从经济建设、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完整系统地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

十三大于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举行，《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是政治报告的题目。报告共分为7个部分，报告指出，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报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指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根据这个理论，报告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据此，报告分别提出了发展经济战略、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中的党的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诸方面的基本方针。

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江泽民向大会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政治报告。报告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十五大于1997年召开，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政治报告共分为10个部分，报告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了深刻的阐述。

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江泽民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共分为10个部分，报告号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2007年召开的十七大，胡锦涛作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政治报告，共分为12个部分。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报告提出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整个报告的主题也就是大会的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过6次全国代表大会。6次大会的共同的主题词有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建设。对比新中国成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召开的3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把握时代主题的巨大变化。

（党史文苑）

盘点历次党代会会址

上海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在上海市卢湾区新天地商业区的东南,有一处游离于商业繁华之外的僻静建筑,当路人行至此处,每每会不由心生肃穆。这里是兴业路76号,门牌下是一块闪光的牌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上海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嘉兴市南湖风景名胜区(中共一大旧址)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进行到中途,因遭到法租界巡捕的袭扰搜查而被迫停会;8月初,“一大”代表们秘密转移到嘉兴南湖,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会议。



嘉兴市南湖中共一大旧址

上海辅德里625号(中共二大旧址)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



中共二大旧址

广州恤孤院后街31号(中共三大旧址)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等30多人。中共“三大”旧址位于广州市东山区恤孤院路3号,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三大旧址

武汉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第一小学开幕。这里今天已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的圣地。



武汉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

莫斯科近郊(中共六大旧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六大在中共党史上有着特殊意义,同时,六大又是中共历史上唯一在海外召开的党代会,更为这座会议旧址平添了特殊的色彩。



莫斯科近郊的中共六大旧址

延安杨家岭(中共七大旧址)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如今杨家岭已经成为红色旅游胜地。



中共七大旧照

全国政协礼堂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



全国政协礼堂



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西侧,西长安街南侧。人民大会堂每年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五年一届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也在此召开。

(蜂鸟网)

十九大前发布的这则重磅意见，很有意味

9月25日晚的一条消息，引来了不小的反响：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一则意见，内容是“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今天的解读也已颇多。具有代表性的共识是，这是中共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并从全局的角度，就如何营造更好环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和发挥企业家作用作出制度性安排。

在临近十九大的时间节点上公开发布这一文件，意味是很多的。

一

在侠客岛看来，如果要概括这份《意见》，其实是在向三方“喊话”——

对企业家来说，《意见》的意味是要“放心”、有安全感、预期稳定（不仅包括民营企业、也国有企业）；对政府来说，中央文件的意味在于厘清边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社会来说，要尊重、鼓励企业家，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心理。

其中，“预期”是根本性的问题。

它代表着没有、或很少后顾之忧，至少很少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要让企业稳定地投资、放心地改进技术、升级设备、雇佣人员、扩大再生产，需要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多层面的稳定环境。发展的前提是稳定，稳定的核心就是预期稳定。

因此，在文件的“总体要求”之后，排在第一位提出的是“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就丝毫不奇怪了。

事实上，这一点也并非直到昨天才提出。随手撷取几例——

2016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的“权威人士”谈经济的文章，就专门向市场喊话，“让企业家既有‘恒产’又有‘恒心’”、“不要盲目翻旧账、使创业者有安全感”；

2016年11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

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直接从最要害的产权保护入手，提出要“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同时，要“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首次提出“妥善处理历史产权旧案”，也被认为是对处置企业家“原罪”的方向性指引；

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是强调“稳定民营企业信心”，以及“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

毕竟，作为市场活动的主体，企业、企业家的预期不稳定，社会经济就会整体受到影响。

二

对于整体国民经济来说，企业最基础的作用在于解决就业、贡献税收、拉动经济。

数据的说服力是明确的。早在2011年，仅中小企业，就贡献了中国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50%以上的税收，并创造了中国80%的城镇就业；财经作家吴晓波则称，到2016年12月，中国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加起来，贡献了中国55%的税收、制造业70%的工业产值和95%的就业机会。

过去十年，民间投资曾是中国高速发展的重要活力来源。2006-2012年，中国的民间投资增速保持在30%-50%的高水平；民间投资在整体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2006年是36%，2015年12月则是64%。

因此，在经历了2016年民间投资的大幅度下滑、十年内首次民间投资增速低于总投资增速后，国务院专门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之后多部委跟进施策。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2017年上半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再次来到7.2%的水平，比上年同期加快了4.4个百分点，助力中国上半年经济交出了不错的答卷。

之前民间投资增速为何下滑？企业为何信心不足？在不少学者的分析中，“对产权保护不放心”，

“对人身、资产安全方面的担心”是一项扎眼的原因。也是部分出于这样的担心,海外追逐绿卡、资产外流甚至是“转移”,就成了一些企业家的“理性选择”。

在与多名企业家的交流中我们发现,他们“抱怨”和“担心”的事情有许多共通之处,而这些担心也是多方因素的纠缠。

比如“营商环境不好”,有时涉及到行政效率的低下,有时则是地方政府一些不讲诚信、“换领导换路线”导致的政策反复、吃拿卡要、把企业当“肥羊”来宰的灰色手法;“不安全感”,则大多来自对产权的担心,比如法律的不健全,以及现实中侵害企业和企业家利益的负面案例的“示范效应”。

堵塞不理性的海外投资、遏制资本过快外流是为了中国经济更健康发展,但根本性问题的解决则需要制度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的保障是最根本的保障。法治不彰,灰色的手就肆无忌惮。法治跟得上,各方的权利义务就明确,营商环境、竞争环境才谈得上顺理成章。因此,在今天《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中,经济学家厉以宁就这样写道——

“一是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二是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三是依法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权。这三方面的内容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古语云,‘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句话至今仍然有效。如果社会上的个人产权遭到侵犯,或非公有企业的产权遭到侵犯,法律对产权的保护缺位,那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们预期紊乱,而一旦预期紊乱,创新创业就会失去动力。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唯有使广大人民、众多企业经营者有财产安全感,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公平保护财产权,最重要的就是要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法律是一视同仁的,法律法规让公有财产和非公有财产一律受到保护,使公众有财产安全感,全国上下都会因为有良好的预期而产生动力和活力。对于政府而言,为了激发和保护企业和投资人,一定要守信践诺,取信于民。各地政府不能以政府换届或领导人更替等理由违约,不能将公权力凌驾于法治之上。”

三

让企业家“放心”、尊重和鼓励企业家干事创新,并不是“一时之计”,更不是“权宜之计”。

从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无数的企业托起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推动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和社会继续进步,企业的发展壮大、科技探索、产业升级也是根本动力。

去年10月,现任的银监会主席郭树清还在山东任省长。当时,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企业家的作用无可替代》的文章,其中这样写道——

“企业家是创业创新的主体,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这些企业家特别能吃苦,吃常人不能吃的苦,受常人受不了的罪,在市场竞争中经风雨、见世面、长本领。他们普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很深的家国情怀,始终不忘带动乡亲共同致富。我们理解,企业家精神就是永不满足、不断创新、追求卓越。”

不可否认,企业家如同其他社会人群一样,也会有缺点和错误,也有违纪违法现象,甚至也会有人犯罪。但是,这丝毫不能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我们不断认知、不断调整、不断提高的过程,企业家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进步的,难免会有人磕磕绊绊,甚至掉队落伍。有的企业家过去犯下错误,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应当全面地、历史地分析对待,这样才能更好地总结教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活力,就是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我们需要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站位高远、立足当下、推进现代管理、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下大气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让企业家有更高的学习能力、更强的法治意识、更多的创新机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发挥更大作用。”

这样的文字,仍然适合当下,以及将来。

(侠客岛)

忙人郭明义



当选十八大代表之前,郭明义三十多年如一日每天早上五点下采场巡视工作。右一为郭明义。(受访者供图/图)

十八大之后,郭明义在沟通工人与鞍钢集团,甚至与鞍山市委市政府的连结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五年来,郭明义先后帮助鞍钢职工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反映有关生产、工艺、设备、福利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二十余项,都得到了迅速解决和落实。

郭明义的书桌上摆放着一本台历,不分节假日,每一个日期都被大大小小的圈上,“哪天替百姓做成了一件事,我就圈上。”

“更忙了。”2017年8月28日早晨,郭明义一边整理这些年帮老百姓解决问题的记录档案,一边念叨着当党代表这五年的状态。

郭明义是鞍钢齐大山铁矿生产技术室采场公路管理员。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全国道德模范”,2012年他当选了中共十八大代表,此外,他的头衔中还包括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2017年6月30日,郭明义又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无论身份怎么变化,郭明义不变的仍然是最爱身上那套土黄色工服装扮。过去五年来,郭明义要做的事情多了很多,但几乎全都是帮助普通的老百姓。至于人们常常叫他“郭主席”、“郭委员”、“郭代

表”,郭明义都不习惯,他最喜欢的还是被人称作“郭师傅”。

党代表的“爱心团队”

今年4月中旬的一天早晨,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吴坤杖村支部书记吴春雷比平时早上班了一会,但他一到办公室就接到电话:“郭明义来了。”

原来,郭明义听到群众反映,建昌县有许多贫困户无力翻建新房,有的甚至面临房屋倒塌的困境,所以他想去实地调研。

当天一早,郭明义爱心工作室的工作人员邓兆成向鞍钢借了一辆车,载着郭明义一路直奔吴坤杖村。郭明义一到村里,看到哪个屋子破就进去看,他不需要村里特意安排,觉得“安排的都不真实”。

郭明义走进一户贫困户的院子,脸立刻耷拉下来了。院子里那位七旬老人听说郭明义要帮她建房时,甚至给郭明义下跪表示感谢。郭明义赶紧扶起老人,“我心里很不好受”。郭明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人家的生活不易,一面墙都快倒了,他随即号召鞍钢的爱心团队捐款,第二天老人家的新房就开始动工了。

郭明义爱心工作室(下称“爱心工作室”)是2012年3月由鞍钢宣传部为郭明义成立的,工作室成员包括郭明义本人在内,另有三名鞍钢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专职协助郭明义的相关工作。爱心工作室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管理郭明义爱心团队。早在2009年7月,鞍山市团委向郭明义建议,将他原来自己在做的希望工程爱心联队与市团委的慈善义工大队等爱心机构相结合,共建郭明义爱心团队。

现在,郭明义爱心团队下设希望工程爱心联队、无偿献血志愿者应急服务大队等七支大队。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各地市团委、政府向郭明义提议,请他牵头将当地爱心人士聚集起来,成立郭明义爱心

团队分队。据郭明义爱心工作室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数据,目前已经从最初成立时的一支几十人小团队,发展到如今七百多支分队,志愿者人数达到170多万人。

郭明义爱心工作室的刁莹介绍,爱心团队并没有具体的资助范畴,大致包括助学、大病救助、住房建设等三个方面。

鞍钢矿渣开发公司的翻罐工孙宝江是早期跟随郭明义做爱心团队的人之一。做爱心团队,郭明义最常和孙宝江念叨的一句话就是:“账目一定要清晰。”爱心捐款的资金流向和落实问题是郭明义最看重的,也是最担忧的。爱心团队的每一笔款项落实后,郭明义就会公开发布到微博、微信上。

一开始,汇款时产生的汇费,也由郭明义自掏腰包。直到爱心工作室成立,郭明义发现自己的工资渐渐付不起汇费了,这笔钱才由鞍钢宣传部来补贴。

爱心团队分队的成立也有一套严格的审核过程,一般会有当地市团委、政府或公益机构牵线,申请加入团队需要填写团队注册表,介绍团队的情况和加入的初衷,甚至每位团队成员都要逐个填写申请。但之后分队组织的活动以自愿为原则,向爱心工作室报备。

今年6至7月,爱心工作室的刁莹、邓兆成和白弘川对葫芦岛市建昌县和朝阳市的两百多户贫困户挨家挨户地进行走访调研。郭明义自己又进行二次抽查。

最终7月底,由葫芦岛市政府牵头,成立了郭明义爱心团队葫芦岛各分队195支,其中有136支分队参加了帮助贫困户翻建新房的捐款活动,共集资297.96万元,可用于帮助125户贫困户翻建新房。郭明义和鞍钢郭明义爱心团队分别捐款6000元和58.54万元,可用于帮助21户贫困户翻建新房。全部捐款达到357.1万元,将帮助146户贫困户、491位父老乡亲翻建新房。

“精准扶贫不归我管,但只要是党的工作,我就必须尽一份力。”郭明义说。

一次成功的“撤诉”讨薪

郭明义不只是献爱心,他也开始解围济困。郭明义的书桌上摆放着一本台历,不分节假日,每一个日期都被大大小小的圈上,“哪天替百姓做成了一件事,我就圈上。”郭明义说,十八大之后,找他办事的人更多了。

齐大山铁矿修路作业区的推土机班长崔鸣宇跟着郭明义一起工作二十多年了,有什么难事,崔鸣宇都喜欢找郭明义“唠唠”。

崔鸣宇原来的房子位于齐大山镇齐兴社区,那一片棚户区是八九十年代鞍钢分给职工的房子,很多房子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去年冬天,齐兴社区有1727户房子面临改造,工人们要想申报补偿款,必须办理个人产权证明。

然而齐大山矿给工人们回复说,房子产权已经移交鞍钢集团,产权证停办已经有一年多了。崔鸣宇辗转找到鞍钢讨说法,得到的回复是房子在齐大山镇,这事归齐大山矿管。

无奈之下,崔鸣宇只好跟郭明义反映了情况。郭明义二话没说,第二天就赶到鞍钢集团董事长唐复平的办公室。“我和他说,民生问题是重要问题,住房又是重中之重。鞍钢和矿山不能扯皮,你看怎么办?”郭明义回忆,唐复平沉默半晌,吐出一个字:“办。”

第二天,鞍钢就派人到齐兴社区给每家每户办理了个人产权证明,一周下来就办了五百多户。

十八大之后,郭明义在沟通工人与鞍钢集团,甚至与鞍山市委市政府的连结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五年来,郭明义先后帮助鞍钢职工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反映有关生产、工艺、设备、福利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二十余项,都得到了迅速解决和落实。

“说话管用”并不仅仅限于眼前的事儿。辽宁本溪市的农民工姜子军的薪资追讨两年无果,郭明义用一个月就把事给办了。在姜子军找到郭明义之前,从2015年底到2017年7月,姜子军已经辗转于本溪市民山区人社局等十几家政府机关讨薪,长达一年半之久。

事情起源于2015年5月,包括姜子军妻子在内

的32人,为一位叫富源的包工头完成了钢结构彩板安装等工程,并于同年12月底竣工。但工程结束后,总计113645元的工资迟迟未发放。不久,富源本人也消失不见了。

姜子军奔走各级政府部门无果,只好于2016年底向本溪市民山区法院提起诉讼。姜子军等了半年,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法院迟迟未立案。走投无路之下,姜子军刚好看到一份报纸上有关于郭明义“活雷锋”事迹的报道,就这样,他拨通了郭明义的电话。

2017年5月24日,郭明义核实了姜子军发来的书面材料后,立即就此事给时任辽宁省总工会主席关志鸥拟交了一份书面建议,标题为《需辽宁省总工会协调解决的问题》。并在题头上方手写强调:“请再次调查核实,如情况属实,帮助追讨,及时追回。”

但辽宁省总工会认为,该事涉案,正在调查中,不能干预司法程序。郭明义急了,一个电话打给了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郭明义和邱小平同为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常有会议碰面。而邱小平本身主要负责劳动仲裁相关工作。但这次,邱小平给郭明义的回答和辽宁省总工会无二,不得干预司法程序。

郭明义后来跟辽宁英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宝楼咨询,王宝楼给郭明义的建议仍然是,不得干预司法程序。

最后,郭明义想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撤诉”。郭明义让姜子军从法院撤回诉讼,“这下好了,不涉及干预司法程序了”。于是,郭明义又一次拨通了邱小平的电话,他恳请邱小平,“农民工的这点钱一定给要回来”。

第二天,本溪市民山区人社局就找到了姜子军,给了他两个保证:第一,一个月内就此事给出明确答复;第二,如果找不到富源,拖欠的薪资由政府垫付。本溪市民山区公安局出动后,没几天便找到了富源。按照约定,姜子军等人9月份就能拿到所有薪资。

姜子军其实从来没见过郭明义,他只是给郭明义打电话、寄材料。“这种事(农民工被欠薪)太多了,对于法院而言可能办就给办,不能办就拉倒。”姜子军说,“但郭明义不会,他知道了就肯定办。”

满意的两次发言

在十八大上,郭明义当选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一年后,2013年10月22日,在全国总工会十六届一次执委会议上,郭明义又当选了全总兼职副主席。五年来,许多会议上都有郭明义的身影。

郭明义对自己其中两次发言表示满意。一次是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他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反映了鞍山市魏家屯村农村宅基地补偿款被拖欠五年的事。

今年76岁的谷志娟在鞍山市铁东区的魏家屯村住了大半辈子,八年前区政府开始征占土地,要求谷志娟等1215户村民搬离。村民在并不了解国家对农村动迁宅基地补偿相关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就匆匆搬离,事后补偿款一直未得到落实。

从2009年到2012年,谷志娟隔三差五就跑到区政府讨说法。73万多坪的地,补偿款总额高达六千五百多万,魏家屯的村民一天一天盼。谷志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本来都不指望自己活着的时候能拿到补偿款。直到2014年的夏天,谷志娟在一次去区政府的公交车上,偶遇了郭明义爱心工作室的白弘川,事情才开始有了转机。

郭明义得知此事后,请律师王宝楼代为撰写了诉求书,提交给区政府。但是,区政府却迟迟不见回应。谷志娟每隔一两周就会接到郭明义的电话:“谷大娘,事情怎么样了?”

在听到一次又一次否定的回答后,郭明义决定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说说这事。据郭明义回忆,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认真听了他的发言,还问辽宁省有什么反应。后来,还没等郭明义开完会回到鞍山,就接到区政府电话说已经贷款七千万,将陆续发放给村民。

还有一次,在2016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郭明义在发言中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障人民群众的住房条件很重要。第二天开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原书记郭金龙握着他的手说,“老郭你说得很对”,郭明义回忆道。

郭明义从十八大以后,更加频繁地向周围人讲

述、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和会议精神。从十八届四中全会回来,郭明义和王宝楼会面时,掏出随身携带的会议记录本,“密密麻麻地摘录了习总书记会议语录”。

郭明义回忆自己参加十八大和中央委员会等会议,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每次主持会议都有两个“强调”:一是要聚精会神地把会开好;二是不开会的时候也不要乱跑,严格遵循八项规定的要求。

郭明义说,他在会议期间哪也不去,就窝在驻地开会、讨论,吃饭、休息,“那些想请我吃饭的人,不少已经落马了。”

把房子捐了出去

当十八大代表之前,郭明义三十多年如一日每天早上五点半下采场巡视工作。当选十八大代表之后,郭明义仍然每天早上五点到单位,不过要先在办公室进行“晨读”——两小时的政治理论学习。

在十来平米的办公室里横放着两张大长书桌,一张摆放着电脑等日常办公用品,另一张更大的书桌上叠放着四摞约半米高的书籍。有《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摘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等。

“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郭明义将此作为座右铭,时刻告诫自己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素养。办公室的四面墙上贴满了习近平在各个时间段的重要讲话,以及一张张开始发黄的《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旧报纸。“有党中央重要指示的我就会剪下来贴上去,经常看看。”郭明义说。

“别看郭明义整天寻思着帮这个人帮那个人,家里的事他基本不管。”这话是郭明义的母亲说的。在刁莹眼里,郭明义的母亲“政治觉悟特别高”,如果有人硬往郭明义母亲家送东西,她总会叫来刁莹,“让郭明义赶紧拿走送回去”。

郭明义与亲戚朋友交往要求严格。十八大以后,郭明义就对周围的亲戚朋友约法三章:“你们在外所有事情都不许打着我的名义,所有行为自行负责。”

这些年来,郭明义的女儿郭瑞雪无论升学、结婚

还是生子,郭明义从不办酒席。倒是得知爱心团队里孙宝江的儿子去年考上大学,郭明义撺掇他:“来几桌?”孙宝江把手一挥,摇摇头。孙宝江觉得这是郭明义在告诫他作为一名党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遵守八项规定,不忘初心。

郭明义三次把家里的电视捐出去,不记得捐了多少辆自行车,甚至连房子他也要捐出去。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后,郭明义发现自己名下有两套房产,一套是自己当时正在居住的四十平米房子,靠近齐大山矿;另一套是鞍钢奖励给他的六十平米房子,位于市区。

于是郭明义开始寻思着捐房子。由于鞍钢奖励的房子不能转赠,2013年郭明义便把自己原先居住的四十平米房子过户给内蒙古来鞍山打工的困难群众陈玉红。

过去的郭明义是个浪漫的文艺青年,闲暇时喜欢唱歌、写诗。郭明义坦言,现在忙起来了,“歌也不唱了,诗也不写了,都用来开会、学习。”

今年59岁的郭明义,还有一年就到退休年龄。他还是常常参加无偿献血。献血站的工作人员劝他一般人55岁已经是无偿献血年龄的极限了,别再献了。可郭明义说,正因为自己能够献血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这样的机会,他才更加珍惜。“我感觉他可能是觉得离退休越来越近,无论大事小事,想为老百姓能做一件是一件。”刁莹说,郭明义这两年就像箭在弦上,把自己绷得越来越紧。

五年来,不断有人向郭明义“告状”,给郭明义更深的思考是——法律应该怎样更有力地保障人民的权益?“他这两年一直让我推荐法律相关的书籍给他读。”律师王宝楼说,郭明义十八大以来每年要转给他一两百封信件,都是涉及法律纠纷的诉求书,由他负责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其中不少案件,郭明义都会移交鞍山市委政法委监督处理。

“有的能解决,有的也不能。”不过,已经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的郭明义说,他正在考虑在十九大时提一些关于司法改革的建议,具体的他还没想清楚。(南方周末记者 贺佳雯 2017-09-15)